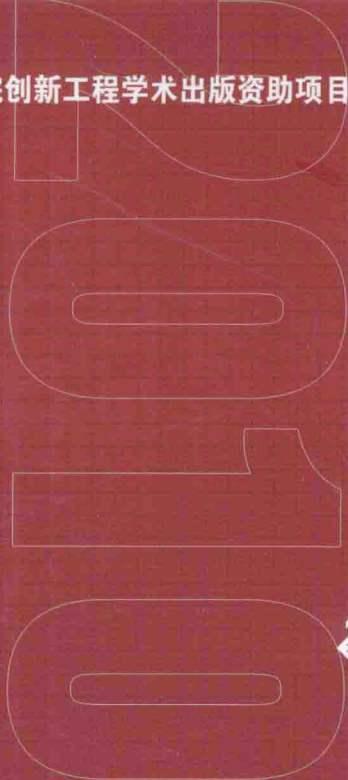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FINANCE

杨志勇 主编

财政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总主编：金 碚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FINANCE

杨志勇 主编

财政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杨志勇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96-3418-9

I. ①财… II. ①杨… III. ①财政学—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F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239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高 娅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超 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16
印 张: 23.75
字 数: 53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3418-9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专家委员会

主 任：李京文

副主任：金 碚 黄群慧 黄速建

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方开泰	王方华	王立彦	王重鸣	毛程连	包 政	史 丹	左美云
石 勘	刘 怡	刘 勇	刘伟强	刘秉链	刘金全	刘曼红	刘湘丽
吕 政	吕 铁	孙玉栋	孙建敏	朱 玲	何 瑛	宋 常	张 晓
张文杰	张世贤	张玉立	张屹山	张晓山	张康之	李 平	李 周
李 晓	李子奈	李小北	李仁君	李京文	李国平	李春瑜	李海峥
李海舰	李维安	杜莹芬	杨 杜	杨世伟	杨冠琼	杨春河	杨瑞龙
汪 平	汪同三	沈志渔	沈满洪	肖慈方	芮明杰	辛 暖	陈 耀
陈传明	陈国权	陈国清	周小虎	周文斌	周治忍	周晓明	林国强
罗仲伟	郑海航	金 碚	洪银兴	荆林波	贺 强	赵顺龙	赵景华
赵曙明	项保华	夏杰长	席酉民	徐二明	徐向艺	徐宏玲	徐晋涛
涂 平	秦荣生	袁 卫	郭国庆	高 闯	符国群	黄泰岩	黄速建
黄群慧	曾湘泉	程 伟	韩文科	赖德胜	雷 达	廖元和	蔡 昉
潘家华	魏一明	魏后凯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金 碚

副总主编：高 闯 徐二明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亢亢	王 钦	王伟光	王京安	王国成	王默凡	史 丹	史小红
叶明确	刘 飞	刘文革	刘兴国	刘建丽	孙久文	孙若梅	朱 彤
朱 晶	许月明	何 瑛	吴东梅	宋 华	张世贤	张永军	张延群
李 枫	李小北	李俊峰	李禹桥	杨世伟	杨志勇	杨明辉	杨冠琼
杨春河	杨德林	沈志渔	肖 霞	陈宋生	周小虎	周应恒	周晓明
罗少东	金 准	贺 俊	赵占波	赵顺龙	钟甫宁	唐 镛	夏杰长
徐二明	郭燕青	高 闯	康 鹏	操建华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对加快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定位要求，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准确把握经济和管理学科前沿发展状况，评估各学科发展近况，及时跟踪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学科建设，特组织院内外专家研究撰写《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本系列报告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支持和肯定，并将本系列报告丛书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服务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合作、世界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包括管理学、创新管理学、战略管理学、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学、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企业信息管理学、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物流供应链管理、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特的学术地位和超前的研究优势，撰写出具有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前沿报告，致力于体现以下特点：

（1）前沿性。本系列报告要体现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包括各学术领域内的最新理论观点和方法、热点问题及重大理论创新。

（2）系统性。本系列报告将囊括学科发展的所有范畴和领域。一方面，学科覆盖具有全面性，包括不同学科的科研成果、理论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以及某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各学科而言，还将涉及该学科下的各个二级学科，既包括学科的传统范畴，也包括新兴领域。

（3）权威性。本系列报告将由各个学科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主编，组织本领域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撰写，无疑将是各学科内的权威学术研究。

（4）资料性。本系列报告不仅系统总结和评价了每年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还提炼了各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及重要学术成果，因此具有工具书式的资料性，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全面体现了经济、管理学科及其分支学科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等。该系列报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其中经济学科 15 个，管理学科 15 个。将按年度撰写出版 30 个学科前沿报告，成为系统研究的年度连续出版物。这项工作虽然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意义十分重大。要想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开展大量的组织、协调、研究工作，更需要专家、学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在此，特向参与本研究的院内外专家、学者和参与出版工作的同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对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本报告的连续出版能推动我国经济和管理学科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金 碚

2013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国内外研究综述	001
第一节 2010 年的中国财政学	001
第二节 2010 年国外财政学的发展	011
第二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期刊论文精选	019
第一节 中文期刊论文精选	019
第二节 英文期刊论文精选	249
第三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出版图书精选	263
第一节 中文图书精选	263
第二节 英文图书精选	285
第四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会议综述	297
第一节 财政学科国内会议	297
第二节 财政学科国际会议	299
第五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文献索引	305
第一节 中文期刊索引	305
第二节 英文期刊索引	315
后 记	367

第一章 财政学科 2010 年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一节 2010 年的中国财政学

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紧紧围绕现实重大财政问题展开，这应是中国转型期财政问题较多的现实所决定的。因此，关于中国财政学研究成果的介绍，本书还是按照主题进行，并介绍相关的理论发展。

（一）“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

2010 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对“十一五”财税改革进行回顾，对“十二五”进行展望，已经成为财政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高培勇主编（2010）对“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税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该研究在对“六五”以来的财税改革作了基本回顾的基础之上，剖析了“十二五”时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作了分析，还对“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支出结构改革、政府收入体系改革、税收改革、预算管理改革、财政管理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取向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安排进行了构建。陈元主编（2010）也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了研究，内容涉及财税体制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阐述了未来 5~10 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高培勇主编（2010）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作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关的借鉴意见。

财税改革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刘尚希（2010）提出了财政公共化改革的一种转轨理论假说。他认为：作为我国财政公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公共财政”这个范畴只有放在中国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它主要解决公共化改革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财政活动的范围和职能定位；二是政府财政活动的方式。其背后对应着观念和认识的前提：市场机制在工具意义上的有效性和公共权力来源的契约性，使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的逻辑关系呈现一种颠倒性变化，前者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中“政府第一，市场第二（补充）”变为“市场第一，政府第二（补充）”；后者从“政府第一，民众第二”变为“民众第一，政府第二”，也就是从“国家本位”（治民）到“人民本位”（民治）。这种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



（二）财政政策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作用在理论界一直有争议，但是，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世界主要国家无不重视其作用的发挥。重新思考财政政策，已经成为财政学界（也包括宏观经济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度偏袒货币政策的主张正在部分地得到纠正。高培勇（2010）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进程作了盘点，对未来走势作了前瞻性分析。贾康（2010）分析了中国宏观调控必须特别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特定原因，以及这种调控的地位和相关的基本要领。王立勇（2010）利用 HP 滤波方法估计了中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中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他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平抑物价波动的功劳不应归属于财政政策，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

蒋伏心、林江（2010）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机制并存的制度背景出发，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较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的分析框架，并利用 1978~200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政治经济周期的存在性、政治周期的财政扩张效应以及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这三个基本假设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还认为，1994 年推行的分税制收紧地方财政是改变原有财政顺周期性特征并实现宏观经济波动趋于平滑的重要原因。邵挺（2010）利用季度数据，用久期模型分析了相机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走出 1992~2009 年间四次衰退的作用。其研究表明，相机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对中国经济走出衰退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公共债务水平的上升会削弱相机性政策协调对经济走出衰退的刺激作用，特别是会严重制约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闫坤、张鹏（2010）对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与通胀“迷局”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了分析。在他们看来，中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

贾俊雪、郭庆旺（2010）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样本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深入剖析了不同经济条件下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理论分析表明，即使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规则也并非最优，其根源在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生产外部性。数值模拟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表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在整个周期内的波动幅度较小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最优通货膨胀率具有高度波动性，持续性很弱；市场权力、风险厌恶和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对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具有重要影响。这对于中国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严成樑、王弟海、龚六堂（2010）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内生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的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并且将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性支出，从而考察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



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从而回到了 Barro (1990) 的结论，尽管他们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 Barro (1990) 差别较大；在基准经济 (Benchmark Economy) 的参数环境下，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从而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三) 税制改革

1. 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税收的经济效应

税制改革的一个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刘佐 (2010) 对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是税制结构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他概要描述了中国若干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历次重大税制改革以后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的轨迹，并探讨了上述比重变化的趋势和进一步合理调整上述比重的途径。

税收负担是税收理论的重要内容。用中国数据来研究税收理论，并为政策选择提供支持，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支配相关研究的进行。间接税是累退税，早已进入教科书。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过去缺少相关经验研究。聂海峰和刘怡 (2010) 研究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对于城镇不同收入家庭间接税负担的影响。他们认为，收入越高的家庭负担的间接税越多，但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却是低收入家庭大于高收入家庭，间接税是累退的；2000~2005 年，所有家庭的税收负担比例都增加了，税收累退程度没有变化。他们通过把税收负担变化分为税收征管和经济结构引起的实际税率变化和消费结构变化两部分，发现实际税率提高是近年来所有家庭税收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

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是中国财政学研究的薄弱环节。缺少相关研究，很容易导致某些税收决策的“拍脑袋”。一般认为，提高烟草税可以降低烟草消费，那么中国的情况怎么样？2009 年烟草消费税上调提供了一次研究机会。

高松、刘宏、孟祥轶 (2010) 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的面板数据，运用传统需求模型 (Conventional Demand Function)、短视成瘾模型 (Myopic Addiction Model) 以及理性成瘾模型 (Rational Addiction Model)，估计中国居民的烟草需求。他们的估计结果支持吸烟是理性成瘾的假设，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子群体吸烟成瘾程度不同，烟草需求价格弹性也不同。他们用估计出的价格弹性，测量了 2009 年烟草税调整的政策影响，发现 2009 年的烟草消费税上调，在不影响香烟零售价格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国家税收收入达 589.87 亿元人民币；如果烟草税的调整在未来传递到零售价格上，预计可以降低卷烟消费 1.75 亿包/年，并增加财政收入 630.36 亿元/年。

2. 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与营业税分立并行，不利于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增值税“扩围”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营业税主要是地方税，增值税“扩围”必须解决好地方政府收入损失问题。施文泼和贾康 (2010) 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中增值税的税权配置和收入分享问题，借鉴了几个典型国家增值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增值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建议。杨默如 (2010) 基于对金融业由目前课征营业税改为课征增值税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应用投入产出表对金融业重复课税规模进行测算,提出了我国金融业增值税制的改革建议,包括:①在税率设计方面,金融业应与其他行业保持增值税税率的一致,但增值税的标准税率需略微降低;②在税基确定方面,应将金融服务全面纳入增值税课征范围,再分项目确定是否给予免征或零税率的特殊政策;③在财政体制方面,从税源性质与征管条件出发,建议作为中央税或共享税,征管主体由两个系统集中到一个系统。

一般认为,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到消费型)能够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转型也会扭曲资本与劳动相对价格,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而过去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中国增值税转型的文献,大多假设中国是处在劳动和资本充分就业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忽视了这个替代作用。和以往研究不同,陈烨、张欣、寇恩惠、刘明(2010)考虑了中国这一特殊国情、要素市场和宏观经济形势,设置了一个凯恩斯和剩余劳动力状况下的宏观闭合的CGE模型,在此框架下模拟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经济与就业的政策效应。他们的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实际GDP的刺激非常有限,却可能造成多至444万人数的新增失业。在同样的减税成本下,如果采取无歧视减税政策,即将原生产型增值税税率向下普调2%,会同时增加就业、更大程度地刺激整体经济和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在中国国情下,无歧视减税政策比增值税转型更优选。

3. 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是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刘佐(2010)回顾了100年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刘怡、胡祖铨、胡筱丹(2010)认为,中国的工薪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设计在诸多方面已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新状况和国民收入分配呈现的新问题,妨碍了所得税收入分配功能的实现。他们针对现行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设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设想。

刘怡、聂海峰、邢春冰(2010)利用2005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使用微观样本数据估计税制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税制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劳动供给存在不同影响。税制改革显著增加了就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增加了3.72小时,但对男性的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在影响个人劳动时间的社会特征中,家庭其他收入、家庭人口的工作时间影响不显著;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具有党员身份、较高教育和工龄使个人工作时间更长;具有城镇户口相对工作时间较少。婚姻和学龄前子女对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有不同影响。

4. 财产和行为税改革

胡洪曙(2010)研究了财产税税率问题。他首先讨论了税率的决定主体应是上级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然后比较分析了浮动税率与固定税率之优劣,最后探讨了定额税率、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实施的理论依据。这些分析和探讨有可能为中国开征财产税后的具体税率形式选择提供相关决策依据。

司言武(2010)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入手,构建了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理论模型。他认为,在次优税收理论架构下,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最优污染品课税的税

率水平只能定位在低于庇古税税率水平上，但引入非同质性假设条件后论证表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可能成立，从而为环境税税率水平定位在高于庇古税税率水平之上提供了可能。

碳税作为有效的市场减排手段，为各国政府所提倡。姚昕和刘希颖（2010）从微观主体出发，考虑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并通过求解在增长约束下基于福利最大化的动态最优碳税模型，得到最优碳税征收路径，并测算其宏观影响。他们发现，开征碳税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并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最优碳税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社会承受力不断提高，最优碳税额逐渐上升。他们认为，开始比较低的碳税可以使经济社会避免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5. 税收征管

税权交易的兴起与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汤玉刚、关凤利（2010）在高度抽象的层面论证了税权交易形成的原因，税权交易的税收负担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税权交易与财政分权指标度量的关系，以及税权交易衰落趋势。压力型体制下，以税收计划指标为依托的纵向税收竞争诱发了地区之间横向的非正式税收合作，使税权交易双方的福利同时得到改进。但这种改进是局部的，随着税收制度规范化程度提高，上级通过税收指标控制税收征管效率的收益递减，内生于纵向指标化管理的税权交易也将淡出历史舞台。

（四）财政支出

1. 财政支出效率

财政资源在竞争性支出项目之间配置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关乎社会发展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直接测度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不大现实，为克服这一困难，李永友（2010）不直接核算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绝对水平，而是采用相对效率的核算方法，即从评价对象中确定一个样本为前沿生产面，以此作为最优财政资金配置标准，根据其他地区与该最优标准的距离函数确定其他地区的相对效率。他通过引入非参数前沿技术对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配置效率进行的估算表明，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配置效率平均只有 0.7，虽然自 1994 年财税改革之后，出现一种整体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较为缓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配置效率，无论是相对水平，还是变化趋势，地区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从时间上看，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配置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差序调整态势。一些中西部地区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财政支出结构配置相对效率上升较快。

中国已经不再对企业提供直接补贴，但各类企业仍然有机会得到以财政专项资金或其他各类奖励名义的另类“财政补贴”。这类“财政补贴”会长期存在，关键在于“补贴”是否公正，效果是否良好。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2010）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企业是否能够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结果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获得更多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负相关，而无政治联系



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正相关。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寻租假设，即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来俘获掌握着财政补贴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而得到更多财政补贴；在制度约束弱的地区，这种寻租行为更加盛行。就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他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支出会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2. 社保支出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养老保险体系选择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从长期来看，以基金制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维持整个体系可持续的均衡运行，但在省级统筹的前提下各地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会显著地影响到基金制运行的市场效率。邵挺（2010）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推断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如果各地的财政能力相差过大，基金制改革只会进一步拉大各地养老基金运行效率的差距。最后，他认为，目前尚处在省级统筹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还不具备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变的条件，只有提高统筹层次，尽快建立起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才能为如此重大的制度转轨奠定坚实的基础。

3. 财政支出与税收的关系研究

金戈（2010）将 Barro 模型关于内生公共支出的基本特征引入 Chamley 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他利用两阶段逆向归纳法，分别探讨了社会第一优和次优的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的一般条件，并通过一个具体例子给出了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的显示路径。最后通过数值模拟，他估计了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

金戈、史晋川（2010）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中包括具有不同产出弹性和消费弹性的纯生产性支出、纯消费性支出与生产—消费混合型支出。在这一框架里，他们探讨了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机制，考察了社会最优路径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给出了一组各种公共支出的最优条件及相互间的最优比例关系，并研究了不同筹资模式下分散均衡路径的福利性质。他们还通过一个特例考察了三类典型公共支出的最优解析路径，并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最后，他们对某些公共服务所具有的拥挤性和排他性特征作了初步讨论。

贾俊雪、郭庆旺（2010）构建了一个最优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理论模型，探寻财政分权和政府组织结构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理，并据此构建计量模型，利用 1997~2005 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纵向政府级次减少和辖区政府数量增加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撤乡并镇”改革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滞后负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财政收入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财政收支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对称性影响自 2002 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以来以及在东部地区均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财政分权特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组织结构特点。

张克中、冯俊诚、鲁元平（2010）从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共支出结构两个角度，论述了

财政分权和贫困减少之间的理论联系。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增加亲贫式支出的配置效率来实现减贫目标；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而地区竞争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阻碍减贫目标的实现。他们利用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数据发现：就北京、上海和天津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恶化了贫困状况；而对于其他省份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则有利于缓解贫困。

（五）政府预算改革

王雍君（2010）研究供应面方法的预算改革问题，分析了源自参与式预算的挑战。参与式预算的兴起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传统上采用的供应面方法预算改革及其有效性提出了有力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下一阶段我国部门预算改革的新方向：融入参与理念的需求面方法。他认为，融入需求面方法的预算改革需要链接一个磋商性预算过程、融入规划元素和最低限度的预算透明度。

政府预算改革既是制度改革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将仅仅反映收支状况的政府预算升级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体系，需要技术支撑。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就是中国政府预算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政府资产负债全景图可以理解为由全面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境况的财务报表、附注及一系列其他说明性报告所构成的报告体系的总称。常丽（2010）介绍了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简单地说，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资产负债全景图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为起点、以主要财务报表为主体，由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主要财务报表、报表注释、未经审计的补充信息和托管信息四个层次的内容构成。日本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完整反映政府财务状况来增强对公众的受托责任，即形成一套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全景图”。美国和日本政府资产负债信息披露全景图展现了全面反映政府财务境况的两个侧重点，即通过表内信息与表外信息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反映政府财务状况。

（六）政府间财政关系

1.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总体思路

杨志勇（2010）认为现在已到全面改革财政体制的时候了。他对财政体制运行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和可能遭遇到的挑战作了全景式的概括，提出要实行分税、分租与分利相结合的财政体制。张晋武（2010）旨在纠正目前流行的政府间收支权责配置原则的理论偏颇与欠科学之处，为构建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进一步改革、完善财政体制提供正确的指导规范。他认为，按照分级财政体制的要求和对“事权”概念的正确解释及解决我国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财政关系矛盾的现实需要，科学、全面的政府间收支权责配置原则应当是“公共服务职责划分清晰，事权财权与出资责任相匹配，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朱青（2010）从国际比较视角探讨了中国分税制的一些热点问题。他认为：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本级收入占的比重较低并不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关键是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不可能给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但可以让地方在中央立法的框架内有一定的选择权，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展中央地方共享税的路径完善地方税体系；下一步完善分税制应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办法，并进一步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白彦锋、吴哲方(2010)对现行分税制体制中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增值税分享比例在不同情景的不同数值,是中央与地方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不断博弈的结果。马海涛、曾康华(2010)在数理分析省际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形成的基础上,利用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的数据,构建三线段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四次财政体制改革对3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人均财政收入变动的影响和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形成的轨迹。研究的结论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有利于缩小省际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斌、杨之刚(2010)从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动性出发,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共需求的偏好显示与排序问题。他们认为,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偏好同质性、支付能力、公共需求排序方式和排序成本是在规范意义上影响政府间职能纵向划分的主要因素。公共需求偏好显示及排序所要求的小政府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效率的矛盾以及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公共产品和服务组合的差异化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是政府间财权事权纵向配置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在区分供应与生产的基础上,归纳了政府间职能纵向划分的基本模式。

2. 财政转移支付

谷成(2010)探讨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设计问题。他认为,在分权化财政体制下,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收入分配的不对称以及包括要素投入价格和生产能力在内的成本差异都将导致财政差异的产生。为消除财政差异,均等化转移支付要求将财政能力均等化至全国平均水平,并对各地区不同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成本予以补偿。在中国目前的分权约束条件下,宏观经济指标法是衡量中央以下各级政府财政能力的理想选择。在支出需求方面,应在承认特定地区成本和需求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以支出需求为基础的最低标准的转移支付,使某些公共服务的财政需求简便而客观地得以补偿。

转移支付的确定必须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各地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导致区域间公共事业发展的单位成本不同,即在不同区域提供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的成本不同。因此,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均等化必须考虑公共事业发展成本差异因素。伏润民、常斌、缪小林(2010)论证了公共事业发展成本差异存在的依据,并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三个方面构建了公共事业发展成本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云南省129个县(市、区)进行了实证测算,得到中国各区域公共事业发展成本差异系数。

中国目前地区财力的巨大差异,客观上要求稳步提高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而现行财政预算体制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约束相对有限。付文林(2010)在地方政府内生性财政选择背景下考察了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行为的激励效应。他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对提高落后地区人均财力有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地方的征税积极性,另外,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可能助长了地方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行政性支出。他认为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对地方征税行为和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优化的激励机制。

财政分权体制下产生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经济发展，却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理性选择。范子英和张军（2010）认为，给予落后地区更多财政转移支付，使其可以分享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好处，且当转移支付的量能使得落后地区参与分工的效用超过分割时的效用时，则即使是在分权的体系下，落后地区也会主动放弃市场分割，而采取策略性分工的政策，进而提高市场的规模效应。利用 1995~2005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他们验证了转移支付能显著带来国内市场整合；且三大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最显著也最大，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作用不明显。他们的结论表明，中央政府确实在利用专项转移支付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但该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范子英和张军（2010）分别采用线性以及非线性方法，分析 1995~2006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转移支付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使得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 0.03 个百分点，这种无效率的水平在西部地区更达到 0.37 个百分点，表明 1999 年以来倾斜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恶化了这种无效率状况，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变化和转移支付带来的激励扭曲都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贾俊雪、郭庆旺和高立（2010）分别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两情势空间德宾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了中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及其构成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不同类型支出的竞争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1995~2008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省级地方政府竞争性支出行为总体上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税收返还与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存在着明显差异。

3. 房价与土地财政

杨圆圆（2010）以 1999~2007 年省级数据为基础，大致估算了全国各地区土地财政规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土地财政规模存在较大时空差异。东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较大，政府支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增长趋势较明显。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地区竞争度、腐败、财政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腐败和财政信息披露的影响更为重要。

以对住房需求和住房供给进行分类控制，实现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为特征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二次房改”），是解决当前房地产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关键所在。张双长、李稻葵（2010）以“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作为分析对象，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当地房地产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之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该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越快，从而证明地方政府的确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城市房价上涨，因此越是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越会推动房价上涨，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政府收益；同时，在房价上涨时，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越会推动房价的持续高涨，而在房价下跌时，这些地方政府相对更不愿看到房价下跌，从而在数据上表现为房价变动幅度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随房价处于不同的上涨（下跌）区间而不同。他们的结论表明，由于土地财政的存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发展体制改革不能仅